

在地發聲、媒介素養與社區行動 —彰化縣員林鎮《員林鄉親報》之個案研究*

孫曼蘋**

投稿日期：2010年2月10日；通過日期：2010年11月24日。

* 本文整理自國科會 94 年度之專題補助計畫《參與式社區媒介：彰化縣員林鎮《員林鄉親報》、南投縣草屯鎮《匏仔寮社區報》的個案研究》（NSC 94-2412-H-004-012）之部分成果。本文曾於中華傳播學會 2008 年會暨論文研討會中發表。感謝國科會，所有《員林鄉親報》參與者及員林鄉親受訪者，以及研究助理政大新聞系碩士班陳怡萱、黃柏堯及廣電系碩士班萬年生（均已畢業）的協助。

** 作者孫曼蘋為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mpsuen@nccu.edu.tw。

《摘要》

本研究自 2000 年起，長期觀察在九二一大地震重建區興起的一份社區報——《員林鄉親報》的運作個案，探討公民如何通過社區媒介近用、媒介素養及賦權過程而促進改變。

研究發現，《員林鄉親報》在其特定的社區脈絡下，以參與、報導、媒介素養、社區行動等要素交相運作，形塑了一個非線性的、動態的社區傳播新貌，此一創新形式不但擴大了社區公共領域的範疇，從傳統媒體延伸到市民的社區行動上，它也顯示，草根媒介也可能與主流媒體競爭、協商、合作，進而通過賦權促進社區及社會改變。

關鍵詞：社區報、社區傳播、參與式傳播、媒介近用、媒介素養、傳播與賦權

壹、研究動機

台灣媒介素養教育起步算晚，直到 2003 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媒體教育政策白皮書》，正式將之納入教育體制下，在中小學有階段性課程設計及教材，大學則普設於通識課程中，媒介素養教育從此在年輕世代身上扎根。但是，21 世紀的台灣，一般民眾的媒體素養養成應該如何進行？與校園體系內的媒介素養教育內涵及意義有何異同？相關討論或陳述似不多見。

目前部分社區大學雖已有相關課程，整體而言，以社區大學為主力的社會學習體系裡公民媒介素養的學習才剛起步。但是回顧臺灣社區傳播／媒介的發展，我們發現已有一些基層民眾早就以不同的社區參與形式，去了解、詮釋媒體，甚至還與社會行動交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由下而上的自發性學習形態，並且藉由與主流媒體合作、協商、反制，促成社區、社會有所改變，例如發行 30 多年的埔里鎮社區雜誌《水沙連》（孫曼蘋，2002 年 5 月）、以反水庫聞名的美濃鎮《月光山》雜誌（林福岳，2002）、以及 921 地震重建區的多家社區報運作均有跡可尋。本研究就是追溯 921 地震重建區一個社區媒介個案，來探究這段個人及社區自我學習的過程及其意義。

台灣在解嚴前，社會行動者大多以基進的社會運動去衝撞媒體體制及意識型態，如政論（或稱黨外）雜誌、地下電台（翁秀琪，1993）、第四台、民間錄影帶（管中祥，2009）等異議媒體，這類型運動多半是爆發力強、但不持久（馮建三，1995）。約從 1990 年代中期起，民間行動能量從街頭抗爭逐漸回到地方基層、持續性的嘗試從社區發聲來與社會互動，與主流媒體互補，形同西方 70 年代崛起的「新社會運

動」，這樣的演變不但擴大、豐富了台灣的傳播媒介光譜，也為社區傳播開創新局。此一重大轉折源自一場跨世紀的天災及重建。

在 1999 年 9 月 21 日，台灣中部地區發生了百年來最大的一場地震，傷亡空前慘重，政府投入龐大資源進行長達六年的重建工程。

在重建過程中，許多民眾透過他助、自助、市民自覺，使原本被邊緣化的社區轉而成為政府資源配置的要角，進而塑造了一個新的社區文化。作為社區重要機制之一，社區媒介在這過程當中有其一定的作用及意義。

地震發生後一個月，各地社區報刊有如小草般快速冒出，數量多、規模小、出刊頻率快慢有之（不定期、週刊、雙週刊、月刊均有）、型態也多樣多變（有影印式的傳單、對開或四開的小型報、新聞信、電子報等）、議題聚焦在救災及重建、批判火力強，顯得生猛有勁！根據「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簡稱為「全盟」）統計，到 2001 年 7 月止，重建區前後約有 80 餘種社區報刊進出（謝國興編，2001）。在政府進行重建五年期間，這些報刊大部分有起有落，卻也靈活機動、韌性十足，有的停刊、復刊再停刊，有的則改以別種形式繼續發聲，如更經濟的摺頁，或自拍錄影帶小規模傳觀，或是網路書寫（孫曼蘋，2009）。到 2010 年年中為止，本研究追蹤發現，至少還有 3 家報刊在定期發行（台中東勢鎮《山城週刊》、台中石岡鄉《石岡人》社區報、南投國姓鄉《國姓報導》）。

這些社區媒介建立了一種另類（alternative）的媒體與社區互動模式，也無意間展開了一場社區傳播新形式運作的實驗。

新形式社區媒介最大特色是「由在地人做在地報」、「從在地發聲」。他們從「做中學」的過程中，習得媒介產製的能力，激發、強化其社區參與的權力及能力，進而改變了這些參與者個人、人際與社區關

airiti

係，也改變了他們原來的社會（孫曼蘋，2001年1月）。

本研究是以彰化縣員林鎮的《員林鄉親報》個案為例，來探究地方民眾社區媒介近用的文化實踐、及形塑其特有的社區意識型態的過程。

《員》報是一份以一群員林中小學教師為主力志工，長期苦心經營的非營利社區刊物，是草根民眾實踐傳播過程民主化、建立由下而上、自主參與社區的一個範例，該刊雖在 2005 年底停刊，大部分編採工作者至今仍以更多樣形式持續參與社區公共生活，有的更成了社區行動的領導者，對形塑員林社區文化有一定的貢獻。

本研究探討的核心問題是：（一）《員林鄉親報》參與者在員林特定的社會脈絡下，如何經營運作這份社區報？（二）該報參與者如何從「做中學」習得媒介素養、如何經由賦權促進其個人和社區改變？以及（三）這種社區媒介參與對社會大眾的媒介素養養成有何作用及意義？

貳、文獻探討

本節先討論社區媒介相關概念，接下來再探討媒介素養、與社區傳播賦權（empowerment）的相關文獻論述。

一、社區媒介的概念

社區媒介指的是範圍廣泛的中介的傳播形式（Jankowski, 2002, p. 6），此一詞彙除了有地域的概念外，還有是指與主流媒體明顯不同的媒介（Forde, 1997, 1998）。

全世界對社區媒介有不同的稱呼（Forde, Meadows, & Foxwell, 2003），如獨立（independent）媒介、地方（local）媒介、公民近用

(access) 媒介、基進 (radical) 媒介、另類媒介、鄉村 (rural) 媒介、或非營利 (non-profit) 媒介，各稱呼含意未必完全一樣，我們或可泛指為那些被主流媒介拒絕接近使用的社區或群體服務的媒介 (Thomas, 1993, pp. 63-65)。簡言之，包括社區報在內的社區媒介，是刻意與主流媒體不同、甚至有對立、抵抗等政治意涵。

社區媒介具有若干「另類」特性。Hollander 早在 1975 年時即提出以含意更廣的社區傳播一詞，代替前文述及的各種概念相似、形式多樣的社區媒介 (Hollander, Strappers, & Jankowski, 2002)，Hollander 等人進而主張社區傳播也是公共傳播的一種，只是規模小，而且是在其特定的社會脈絡下進行 (Hollander & Strappers, 1992; Hollander et al., 2002)。其次，透過中介進行的社區傳播，其形式、風格、技術無所不包，這些媒介不論規模、風格、內容均不同於大眾媒介的大量、正式和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d)。

社區傳播的另一另類特性，就是閱聽人也參與資訊產製過程，即作者也是讀者，最能體恤居民感受，其所探討的議題都是和傳送者、接收者相關，因而更能貼近「在地話題」(“local talk” narratives; McCallum, 2007; 轉引自 Meadows, Forde, & Foxwell, 2009)，而且能呈現多元觀點、各方社區利益，創造公共意識 (public consciousness)，於是在共享利益的再製與再現中，社區媒介遂產生了社會、文化與政治上的意義 (Hollander, 2002)。

一般營利性社區媒介，如美國各地的社區報，即使規模及發行有限，仍舊唯經營績效是問，但是由常民參與的社區媒介，如社區有線電視，著重的是草根民眾的創作「過程」，而非「產品」品質 (Boyle, 1997, p. 34)，也非商業邏輯下的收視率這類數字，或節目、產品的價值 (Devine, 1992; Johnson, 1994; 轉引自 Higgins, 1999)。此外，社區

媒介還有教育功能、刺激弱勢團體的集體察覺（group awareness）（Nigg & Wade, 1980），它也是促進文化公民權的文化資源，且在一系列文化實踐中居主導角色（Forde et al., 2003）。社區媒介既是文化資源，也是民眾伸張有權參與公共生活決策的政治資源。

社區媒介雖有這些另類公共領域的價值，但也有永遠無解的組織管理問題——社區媒介多半無固定財源、主持人亦不善於經營管理。包括社區媒介在內的另類媒介，因而常被稱為「另類貧民窟」（Atton, 2002, p. 34），所以都不長命，不過卻也總是前仆後繼，好似一場很有默契的長程接力賽。

英國學者 Williams（1980, pp. 50-63）指出這類民主化傳播特徵有三：去專業化（deprofessionalization）、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去資本化（decapitalization），正好是上述社區媒介另類特性的總結。

這類民主化／參與式傳播的核心概念是參與及互動（McQuail, 1994, p. 132），是通過媒介近用來達成，在社區傳播的研究裡，草根參與、媒介近用幾乎是同義詞。

二、社區傳播與媒介近用

媒介近用權論述的根源有從傳播過程的民主、參與（陳世敏，1992；McQuail, 1994）及政治上的公民權（Murdock & Golding, 1989）不同面向陳述，雖然範疇、格局有異，但均是捨大眾傳播觀點，著眼於小規模、利益團體、次文化團體的自我發聲及取得他們所需要的資訊的權益，而提出了個人有權參與媒體的積極主張。換言之，媒介近用強調的是眾生平等，任何非傳播專業的公民、組織或社區，均可主動接近及使用媒介設備、參與內容製作及經營管理運作。

媒介近用的實踐，雖可溯及 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的英美兩國，隨著反越戰、反政治、反文化的社會運動而出現的大量的地下／獨立媒介（有報紙、雜誌、紀錄攝影／錄影帶等），後來這些媒介與社運漸漸轉向社區議題，與社區組織、社區居民結合一起改造社區，但這類研究較少觸及近用這個概念，這可能是因為歐美早就沒有平面出版、或民間自製影像的政府管制之故。

媒介近用與社區關係之討論大部分是來自電子媒介近用的相關研究。在 1970、1980 年代，美加、歐洲、澳洲等各工業國先後興起電子媒體近用運動，彼時，這些媒體先進國的政府為回應草根、弱勢族群的要求，相繼透過立法、允許開放電子頻道給社區或社群民眾近用（Barlow, 2002; Lewis, 2002）。這些倡議者所提出社區廣電媒體開放於民的基本精神，可以澳洲廣播社會運動的主張為代表，即「近用與參與，獨立、非營利與非商業，多元化與多重性，以及另類」（Barlow, 2002, p. 141）。但是這段期間的學術討論多半偏重在實踐面，少數概念性論述也只聚焦在言論自由方面。一九九〇年代初，學術界有了深刻反思，開始討論社區媒介近用、媒介素養和社區改造間的關係。

Higgins（1999）和 King 與 Mele（1999）深度訪問美國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頻道電視節目製作之經驗時均發現，受訪者經由基本技術訓練、邊做邊學邊反思中習得了若干媒介素養，並經由賦權而改變了社區；這些研究者尤其強調做中學能培養參與者對商業媒體宰制的質疑意識。King 與 Mele 在其文獻整理中指出，社區民眾參與電視製作會自然累積其媒介素養，使他們更可能去批判性的檢驗、挑戰商業媒體常規性的內容生產，他們也論及，當參與者將其構想轉換成內容時，本身就是一個反思、質疑的過程，即使他們當初參與節目製作時並沒有多強的政治動機，但產製過程就是一個政治性轉換：通過訓練課程及做中學，參

與者不但學得電視製作技能，取得了製作權力及技能，也獲得了公共領域中文化面、社會面的基本質疑能力。King 與 Mele 在其研究中指出，這就是賦權效應，而所謂社區良善（community good）也應包括那些原被主流忽視、誤解的邊緣族群，以及他們抵制主流媒體掌控的各種可能作為。

這些研究及討論均顯示，參與式社區傳播與媒介素養有了對話，媒介素養的學術討論也從學校體系延伸到了社區或社會體系，再者，媒介素養養成與賦權幾乎是同步而來，但是這兩個概念在社區傳播研究領域中的討論都相當含糊，本文試從源頭追溯。

三、媒介素養

媒介素養概念及內涵，一直隨著科技、社會思潮及傳播理論演變而改變。雖然有學者指出，西方媒介素養發展歷程猶如媒介本身一樣長久（Anderson & Ploghoft, 1993），美國 1970 年代有了電視素養課程，1980 年後與英國於 1960 年代就有的媒介教育相結合，之後歐洲澳洲各國中小學相繼開設課程（Schwarz, 2005），媒介素養早就成為西方國民教育的傳統之一，但其內涵為何，各方見地始終不一，也一直是學者在對政府相關政策獻言時辯論不斷的議題（Livingstone, 2004）。1992 年，在美國「全國媒介素養菁英會議」上終於得到一個各方可以接受的定義，一般而言，媒介素養是指以多種媒介形式去近用、分析、評估、製作媒介的能力（Aufderheide, 1993; Christ & Potter, 1998）。這四要素相互支援，形成一個非線性、動態的學習過程。

此一基本內涵雖已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論述，但是仍有一些學者提出質疑。有人認為這個定義對學生應具的四種能力沒有重點強調，像英國

媒體教育佼佼者 Masterman (1985, 1992) 就認為，訓練學生自主思辯和製作內容的能力才是媒介素養最重要目的。

科技演變也成為辯論焦點。從 1990 年中期起，網路、數位科技更迭更快，新媒介需要更多新的媒介及科技素養，上述定義似乎無法應付新科技帶來的挑戰。英國學者 Livingstone (2004) 以為，現在的媒介素養應超越前述只以個人技能為本位的層次，需更具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方面，洞悉文本、能力 (competence)、權力三者相互關係的思辨及行動能力。Hartley (2002) 更早即辯稱，媒介素養可以是社會控制或規範的工具，是爭取解放的一個進步武器。這些以媒體文化為主軸的主張似乎更積極、前進，均強調今天的閱聽人不但要有理解、詮釋、思辯能力，更要有主動參與社會的行動能力，也就是從消費者成為有行動力的公民。

採取行動的最佳場域就在社區。在整理歐美媒介素養觀的流變時，吳翠珍 (2004)、陳世敏 (2005) 相繼指出，以往媒介素養教育過分專注於批判媒介的負面內容，以致忽略了社區行動的重要性；來到 21 世紀，媒介素養觀主要內涵已進展到參與式的社區行動階段，「如何喚起民眾採取行動，跳過專業干預，由民眾積極介入媒介的內容製作並取得發聲管道，才是賦權式的媒介素養教育的重點。」(陳世敏，2005，頁 19) 陳氏清楚、直接地對常民社區參與提出了媒介近用、媒介素養、行動與賦權的整合概念，可說是為台灣本土的社區傳播、社會大眾的媒介素養教育提出了更多的期待與想像。

但是這樣的主張在台灣當下情境中，常民近用社區媒介的實踐如何？透過「做中學」，參與者養成的媒介素養為何？理念面與實踐面有何差距？這正是本研究針對《員林鄉親報》個案要加以分析、檢驗的。

四、社區傳播與賦權

「賦權」概念的起源，一說指其源於 1960 年代的奴隸、黑人及公民運動下所帶動的賦權教育思潮（Freire, 1972；轉引自張麗春、顏婉娟、呂素英，2006），一說指其源自 50 年前的社會行動名詞（王麗雲、潘慧玲，2000；Zimmerman, 1995），還有一說指賦權概念源自 1970 年代互助和自助的傳統，及近代的解放運動或社會運動（黏容慈，2004）。雖然有賦權意涵的社會工作理念超過一個世紀（Solomon, 1976），但社會工作實務中真正進入所謂的賦權時代是在 1980 年代左右。早期賦權常和激進的社會運動聯想在一起，現在，賦權概念廣泛運用在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工作、社會發展、社區心理、醫療護理、公共衛生、教育及企業組織管理等領域，可見賦權意涵也是隨著社會變遷而不斷改變，引用的學門或領域越來越多，各自領域的實踐及討論也多少有些分歧。

賦權定義繁多（Rogers & Singhal, 2003）。一個較精簡的說法，賦權是指增強個人、人際、或集體的政治力量，使個人、團體或社區有權力和能力採取行動、以改進現況的過程（薛曼娜、葉明理，2006；Gutierrez, 1994；轉引自 Boehm & Boehm, 2003）。

這段陳述不但指出賦權就是讓弱勢者獲得及強化權力、能力，也清楚強調從個人到群體均是主動、集體採取行動，另一個意義更在改變公共生活現況。賦權可說是在完成一個政治過程。

賦權是多層次結構，每一層次又相互影響（Zimmerman, 1995）。在個人層次上，指的是對個人所能控制的生活方式、社會政治環境的瞭解等有一整合性意識（如產生自尊及自重感，權力、控制和自主感）；

在組織層次上，賦權能讓個人或群體更有效益的爭取到資源，以及與其他組織建立網絡、擴大影響力等；在社會層次上，賦權則可使組織一群人一起工作，以改進集體生活，並與協助維持其生活品質的社區組織或代理者保持聯繫。

賦權先從個人開始，一個人心理層面的轉變有助於組織、社區等層面的賦權，如 Gutiérrez (1994) 認為，當個人發展出批判意識或意識覺醒時，才能進一步了解個人與社區的關係，於是動念想行動、進而採取行動改變社會的權力關係。

賦權須經反思、即意識化才能形成。通常團體成員由外部引導，藉由要求改變的意念 (altered consciousness)，以及察覺到社會次序不公平、也不中立，才能形成賦權過程。這種意識化作為 (conscientization) 是一種教育，透過教育、啓發其思辯意識，及創造出新的社會團結形式 (form of social solidarity)，使人從想要自主、又害怕自主的矛盾情節中解放出來 (Chattopadhyaya, 1983, p. 98; Freire, 1968; Jayawardana, 1988; Liddle & Joshi, 1986；轉引自蔡鶯鶯、徐永年、林永隆，2003)。

傳播文獻出現賦權這個名詞，約是 1980 年代晚期，大多用於討論組織傳播，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貧窮、受壓迫者 (如受家庭暴力婦女) 如何經由各種不同賦權形式 (如教育) 來改變現況 (如 Rogers & Singhal, 2003)。自 1990 年中期起，許多學者將之引用來討論社區、社群傳播議題 (如蔡鶯鶯等，2003；Atton, 2002; Forde, et al., 2003; Higgins, 1999; Nossek, 2003; Novek, 1995; Pinkett & O'Bryant, 2003)。

這些研究很多都是討論如何經由外部權力來為弱勢者賦權，Hamelink (1995) 則提出自我賦權 (self-empowerment) 的主張，強調讓無權者擁有、控制媒體，「讓無聲者發聲」 (giving a voice to the voiceless)，進而為自己說話 (people speak for themselves)。以色列學

者 Nossek (2003) 則明確指出，公民雖有自由及表達之權，但一定要自己先採取行動，才能獲得賦權。這裡自我賦權強調的主動行動，本文以為就是前述社區媒介強調的積極近用。我們或者可以說，在社區傳播領域講賦權，就是指民眾主動近用媒介之意。

媒介近用、媒介素養到傳播賦權的論述，初期討論雖各有其據點，但到 1990 年中期以後，都到「社區」這裡來交會。在社區傳播的概念裡，民眾有權積極主動近用媒介，以個人或社區集體方式參與製作內容、甚至自行運作媒體，常民可經由「做中學」、習得媒體素養相關的知識及能力，透過反思、自覺、行動，進而去強化組織及社區能量，以促進社區及社會改變。

依據前述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本研究針對彰化縣員林鎮的《員林鄉親報》個案、探討的問題如下：

- (一) 《員林鄉親報》產生的背景，即其歷史脈絡、社會情境、在地文化情境如何？
- (二) 市民如何參與、經營《員林鄉親報》？分別從組織結構、內容呈現、經營運作等面向探討其出刊定位及實際運作之狀況。
- (三) 這些長期參與社區報產製及營運的市民，習得哪些媒介素養？是否還有不足？以及
- (四) 這些察覺如何幫助參與者透過媒介近用、賦權，促進個人自我的改變，以及社會權力關係的改變？（由於篇幅有限、員林《鄉親報》已停刊，因此組織賦權部分本報告從略）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長期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焦點團體、二手資料研讀等方式蒐集資料。自 2000 年起，研究者即進出重建區，大量蒐集各家社區刊物。二〇〇三年研究者得一機會密集巡訪新聞局補助的 20 家社區報刊，其中不乏表現優良者，《員林鄉親報》是其一。在 2005-2008 年間，研究者利用假期輪流造訪這幾家社區報所在的鄉鎮，直到今天，還不時與一些社區人士保持互動。

三年期間研究者走訪員林及附近鄉鎮總計六趟，深度訪問了 30 多人次，還有七場、28 人次焦點團體訪談。訪談者包括《鄉親報》核心編採群、供稿者、受訪者、捐款者、放報戶、員林鎮的文史工作者、員林社區大學師生、員林鎮長、彰化縣前縣長、新聞局前地方新聞處處長等人。

為探索員林社區脈絡，研究者也跟著社區報志工一起進入社造現場或被報導者的工作情境，觀察他們與社區人士、社團、利益團體的互動。進出田野期間，正巧目睹《員林鄉親報》由盛到衰的掙扎與奮鬥，更加體會到台灣小眾媒體經營的艱辛。此外，研究者也收集大量的社區出版，其中最珍貴的當然是出刊共計 50 期的《員林鄉親報》，以及由《鄉親報》寫手兌變成多產作家所出版的 10 多本村史書籍。

下一章節即是個案分析。我們先從台灣社區報脈絡、員林鎮的社會情境及社區媒介發展概況開始。

肆、《員林鄉親報》個案分析

台灣媒體的發展和歐美情況相似，即依商業模式經營，業績掛帥、所有權集中。民眾社區資訊取得來源單一，都是由主流報紙的地方新聞版和區域報在主導，不過主流媒體對地方新聞投資有限，新聞報導只限於縣市級府會消息、地方勢力消長、負面的社會新聞或重大災難等，新聞取向都是台北觀點，縣市以下的鄉鎮級地方議題僅是點綴。這種「疏離」情況直到九二一地震後才有改變，一是重大災難之重建資訊本就較引人矚目，一是社區總體營造成果相繼顯現，有報導價值，於是地方社造新聞篇幅漸多，甚至可以佔據週末版面要位。

九二一地震帶來巨大的破壞與震撼，各大媒體莫不傾全力報導，但是仍依常規處理新聞，擺脫不了社會菁英的框架，對重建區居民而言，資訊的接近性尤其不足，加上次（2000）年3月就要舉行總統大選，媒體焦點紛紛轉向；地震後第二、三個月相繼冒出來的社區報，正為填補災區資訊真空而生。

這些社區報不僅傳播資訊，也反映社區需求、讓災民得有機會發聲、更是為社區爭取重建資源的重要窗口，社區報很快就被定位是「家園重建的一環」。行政院新聞局則自2000年7月至2004年3月，以「一社區一報刊」為原則，由位於台中市的地方新聞處（即精省前的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出面，選擇20家社區報給予三年半輔導，每年補助總經費約2,000萬元。¹彰化縣員林鎮的員林《鄉親報》即是其中表現最佳者。

一、《員林鄉親報》簡介

《員林鄉親報》（以下簡稱爲《員》報）是以彰化縣員林鎮居民爲主要發行對象。員林鎮位於台灣西海岸中央略微偏北的地帶，距離台北車程三小時，人口 12 萬 6 千多，是全縣第二大城，僅次於彰化市；員林交通方便，商業還算發達，在一些新住民眼裡「有都會的方便，也有鄉下人的樸實」。員林在日據時期即有「水果王國」之稱，在農業時代，水果、食品加工發達，使員林成爲全台灣數一數二的富有城鎮，但自 1970 年代台灣經濟從農業轉爲工業、過去十幾年初級加工業紛紛移往大陸後，經濟蕭條幾到谷底。目前，居民仍以從事農業居多，消費主力在公教人員。

一如台灣一般鄉鎮，員林人的人際關係綿密，隨便一牽都有親戚關係，人情壓力相對也重；傳統「文人至上」遺風猶在，教師的社會聲望很高，很得一般人的尊重；員林人自認爲該鎮文風鼎盛、學校多、文教活動盛，文史工作者也不少。地震前各團體多半各自爲政，地震後，許多公教人員、中壯年知識份子（即早時所稱的地方鄉紳）集結串連，協力發動不少文史及生態搶救運動，漸漸形塑了一個有行動力的社區人文風景。

九二一地震員林鎮災情不重，但土地液化嚴重，員林雖也被列爲「重建區」，卻認爲政府救災重心都在所謂的「明星災區」，員林遭到嚴重忽略，這也是社區人急於藉社區報發聲的原因之一。

雖然在《員林鄉親報》現身前後，員林鎮也有地方政府或民間發行的社區雜誌或報刊，如《彰化人》、《林子街》，但不是存活短暫、就是地方政府預算時有時無；內容不是過於學術、就是官方宣傳味濃。

《員林鄉親報》定期出刊，適時的搭起社區內外溝通之橋，遂漸漸成爲整合地方資源、勢力的一個平台，進而形塑出一個既參與媒體產製運作、也採取社區行動的社區公共領域的新形貌。

《員》報自 2001 年 4 月出刊到 2005 年 11 月停刊，總共發行 50 期。該報四開篇幅、彩色印刷，每期四或八頁、發行量 6,000 到 10,000 份，還有網路版同步發行。《員》報每月準時出刊，文字、圖片兼顧，強調視覺表現，在新聞局輔導的 20 家重建區社區報中（其中有一份網路原生報），是唯一能自行操作電腦排版、美術設計、有網路版者，整體表現在新聞局的評比中名列第一。

（一）結構面

1. 社區報定位及經營理念

《員》報由彰化教師分會發行，發行人由會長、員林明倫國中教師江錦田出任。江錦田領導教師參與社區救災、創刊《員》報前身《土地之夢》²時還不到 50 歲，他是個道地員林人，念茲在茲的就是在地震重建的當下，要如何提升員林人的社區意識以及教師們的社區參與：

（《員》報）鼓勵鄉親能夠瞭解我們自己的家鄉，產生愛鄉的情懷，協助農民來因應農業的轉型，然後試圖找出一些員林的特色，讓大家對員林有一個認識，能夠都到員林來。或者我還有一些私心，就是讓這些老師思考一下可以如何走出教室、走進社區（江錦田，2005 年 4 月 25 日）？

我本來就沒有把這個社區報當做報紙，所以我不是報人，我只不過是在做一些社區服務的工作，我沒有把它當作是一家報社。……我只是想說我從小在這裡長大，我為這塊土地做一

點回饋的活動（江錦田，親身訪談，2005 年 1 月 24 日）。

在江錦田的認知裡，《員》報並不是報紙，編採群也只是一群有社區熱誠的文史工作者。不過，在尋找它的社區位置時，該報頗能洞悉身處「政黨輪替、百年大震、經濟不景氣、加入 WTO 以及九年一貫新課程實施」大局下（江錦田，2005 年 4 月 25 日），社區報衡量它所能掌握的資源、置身的社區情境，初始就定位在在地文史及自然生態報導上，內容呈現教育味道頗濃。後來進入社區越深，人脈越廣、參與者眾、且背景多元後，在地化風格才越加明顯。

《員林鄉親報》自認為報導很誠懇，非常在意「講了之後要做才是真的」，從一出刊就強調「親自去做」的實踐力，包括刊出的每一篇文章或圖片都是社區志工親力而為的。

我們《員林鄉親報》每一塊東西都是真的，我們精耕，所以薄薄兩張要聯絡很多人。有人跟我說，網路的資料那麼多，抓一抓就有，我跟他說，那我直接回去做陶藝好了，來這裡湊資料做什麼（黃明權，親身訪談，2005 年 4 月 9 日）？

2. 組織——編採群多元、多層

在江錦田領導的救災、心靈重建工作中，發行社區報「只是我這幾年工作中很小的部分」，初衷只是「找一個窗口能讓外面的資源進來」、「也許把在地的聲音發出來」（江錦田，親身訪談，2005 年 4 月 8 日），雖然從未期望要永續經營，但自詡「始終抱著盡力而為的心情，從來沒有退卻的念頭」。在他找來的兩位得力伙伴的全心投入、一群熱心社區人士相互激勵下，《員》報賦權而產生的意義及影響，早已超過最初的預期。

《員》報運作核心是個缺一不可的鐵三角陣容。江錦田原本就是一

些地方組織的領導者，人際關係綿密，因另有社區重建要務，他在《員》報的主要任務就是向外尋找人、財資源，掌握編輯大方向，對內則授權給他的左右手——長於系統化思考的總編輯黃明權（員林崇實高工化工老師，江錦田的高中及大學同學），以及做事牢靠又少抱怨的編輯陳煙船（員林明倫國中數學老師，江錦田的同事及好友）。這兩個出版生手除了上班時間外，幾乎全時投入，經常忙到半夜才回家，兩人全程參與每個出刊環節，到後來從企畫、寫編、拍照、印務到田野調查樣樣通，幾乎成了出版全才。這兩人也因為編報而結識了一群生態迷，在《員》報運作末期乾脆跑去全力推動社區環境保育運動，並稱說這是從坐而言（談社區理念）轉換到起而行（社區行動）。

該報初期參與者以當地中小學教師為主力，展現了在地知識分子走出校園、進入社區的具體關懷行動。半年之後，各行各業的人、退休公教人員、地方社團成員都加進來了，這些人因為《員》報召喚而參與在地知識的發掘及保存，是該報最珍貴的資產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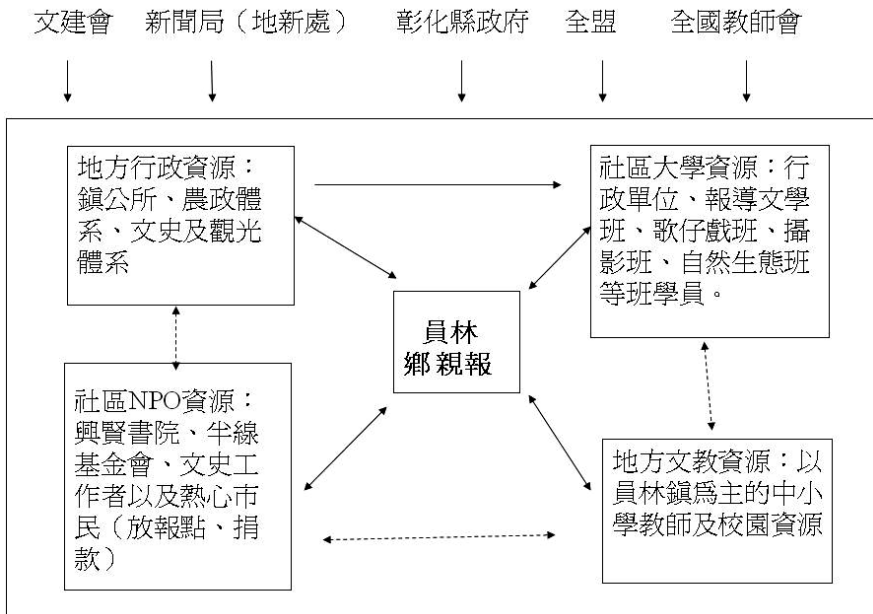
《員》報沒有稿費，供稿者還得自貼交通及耗材費用，卻少有缺稿情形。黃金時期（約第 9 至第 31 期）約有二、三十個編採志工穿梭在編輯室與田野間，³ 這些人幾乎都是辦報生手，但有一定的語文表達能力，邊做邊學，很快就能上手，有些供稿者也是某個領域的專才，如生態攝影、民俗藝術、地方戲劇等，《員》報還有若干業餘攝影行家擔當攝影工作，發行人又勤與員林社區大學師生互動，⁴ 所以常有賞心悅目的圖文作品刊出。

綿密的社區人際網絡是《員》報重要的人力補給網。六、七個固定供稿者背後都各自有好幾串人脈，因此，編輯團隊不論是向專家邀稿、找人採訪或撰稿、做田野調查、或動員各方人力支援其所主辦的活動等都無往不利。另外，新的人際網絡還在不斷擴張，如受訪者會轉介他的

人脈、或是受訪後自己也成爲供稿者（其中不乏國際級的專家或全台灣知名的藝文工作者）、贊助者，還有一群忠誠讀者、地方社團或社區領導人都會提供線索、代爲安排約訪或蒐集資料、提供放報點、贊助經費等，這些人應可都算是《員》報大家族的成員。

再者，定期出版累積到一定聲望後，社區報自然成爲整合平時互動較少的社團及社區資源的中心，也是和員林鎮以外的中央、縣市級以及民間救災組織的溝通平台，更是撰稿志工群快速融入社區情境、建立社會資本的重要中介，這是重大災難社區重建時期、參與式社區媒介的特有作用（詳見圖一）。

圖一：《員林鄉親報》整合社區網絡與資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經營管理

《員》報採非營利方式經營，營運相當單純，財源幾乎全部來自官方，發行則靠社區的人際網絡。

(1)發行——特有的校園系統

一般社區報發行涵蓋的地理範圍較小，多半可以人際傳送或定點取閱，但常有堆積在角落、或被當成垃圾處理掉的情形。《員》報相反，只需擔心它印的份數不夠分配，該報發行一是放置在五、六十個定點讓社區民眾自行取閱，一是只有該報才有的特有管道—即透過教師會系統發送給員林各級學校教師、再由教師發送給學生帶回家給家長。

(2)財務——以閒功夫把錢放大

《員》報編採製作幾乎是零支出，程度整齊的志工熱心投入，「用我們的閒功夫把錢放大，」（黃明權，親身訪談，2005年4月9日）。該報最大開銷在印製，每期平均2.4萬元（6000份、對開、一張），發行量高峰時每月4.2萬元（10000份、兩張）。本研究保守估算，一份社區報一年最多50萬元左右開銷，就可以讓幾十個人快樂、忙碌一整年，還有20萬字上下圖文兼有的社區發展紀錄，以及無法量化的社區凝聚力。

《員》報前三年運作幾乎全由新聞局補助，後期一年半（從37期起）則賴鄉親助印及廣告費支應（兩者比例差不多）。接受官方「輔導」的交換條件，就是每期必須刊出政府重建資訊，但篇幅、內容、刊登位置均無設限。《員》報也不定期提案得到全國教師會、文建會的有限補助辦活動（如舉辦文史、生態之旅等），將重建活動、政府文宣與《員》報資源交互運用；逢到地方選舉時，這份社區報也提供選舉廣告版面，以類似所謂整合行銷方式，為候選人特製「專題報導」，但需求

面仍然有限。

就在重建會運作近尾聲、新聞局輔導結束後，《員》報努力開源，但財源一直不穩，發行人只好小忙編務、大忙財務，身心俱疲下，兩邊都沒顧好，加上核心編輯內部編輯理念有些爭議，導致《員》報末期士氣渙散、品質下降、終至停刊。財源不穩始終是全台灣所有社區媒體的夢魘。

（二）內容面

《員》報內容結合社區與教育，文字淺顯易懂，圖片精美。《員》報從常民生活角度發掘了許多文史寶藏，或以故事手法呈現老家族的新面貌，讓讀者或被報導者都很感動，從編採者到員林人都是看了《員》報報導，才開始真正認識自己的家鄉。

不管我們的編輯或者誰，時常有人講說，就說我長這麼大，我不知道員林有這樣的東西，員林有這樣的人，有這樣的建築，或者有這樣的來歷，這種事要看我們報紙才知道的。還有一陣子幾乎是我們《鄉親報》報導在先，然後記者寫得比較晚（江錦田，親身訪談，2005 年 1 月 24 日）。

《員》報成員尤其感到驕傲的是，這份刊物持續記錄社區重建過程四年多，無意間成了員林鎮的文史寶庫，獲得讀者認同。《員》報及其網站是全鎮九所國小鄉土課程的必用教材，也是研究員林地方發展的必要參考資料，還有讀者逐月蒐集、將 50 期紙本裝訂成合訂本，說是要留給後輩子孫長大後看，一些受訪的「放報戶」在談及這份「非常非常在地的報紙」時，常不自覺的說，「我們」這份報紙如何如何。

《員》報組織精簡，文稿處理流程明快，核心編輯習慣在寫手著手採訪前即充分溝通，文稿稍經過目、下標後即上機排版、送印。這份刊

物示範了草根出版很自然做到傳播過程的民主化，的確具有去中央、去資本、去制度的特性，但是卻不是去專業，《員》報好多「在地化」表現已超越主流媒體之上，後續章節會再細陳。

三、媒介素養

《員》報少數編採人員曾參加過編採、攝影短期研習課程，大體言之，持續的「做中學」才是彼等媒體素養養成的主要途徑。核心編輯、供稿常客都能掌握一般報紙的編採製作技能，部分參與者則能認知媒體運作，或察覺到媒體組織內外的權力關係，甚至超越西方媒體素養教育，在台灣社區特有的脈絡下，建立一種新的媒體與社區互動模式。

（一）近用及製作能力

從一團慌亂到氣定神閒的準時出報，《員》報的成長過程就是從生手到熟手的學習成長縮影。如果說社區報是在地人的發聲管道，《員》報最初六期只能說是一個迷你團隊的發聲練習，聲音有些心虛、甚至有些地方走音，例如一個四開版面，走文沒有分欄，圖片小而多，彩色運用雜亂，社團活動及資料性訊息多、新聞不足。大約半年後，有感情、有故事、在地性的報導漸多，新聞敘事也漸從校園跨入社區，尤其是後製編輯經過實作、摸索後，再去編採研習營上課，回來再自我琢磨、與工作伙伴相互討論、觀摩一般媒體作法，不論就傳播符碼（像文圖、表格、插畫）運用、議題開發、版面視覺表現均有顯著進步。

參與全程 50 期文稿後製及排版的陳煙船，之前毫無編輯概念，電腦排版則是邊做邊摸索學會的，版面設計則歷經發現問題、參加講習、自我學習、解決問題等階段，是一個學、想、做交錯互動的過程。這位

平時說話極為精簡的國中老師，說起編版學習過程可是滔滔不絕：

開始是第一期的時候很奇怪啦，……版面就是擠擠的，沒有分欄，我看了覺得怎麼這麼擠（笑），……剛開始我對編輯不內行，後來聽你的課，……從那時候開始就慢慢對編輯有點感覺。……

（以後）不舒服的時候我就會再琢磨要怎麼改，跟黃老師（註：黃明權）一起討論，大多時候（他）都是採納我的意見。就是說，感覺不舒服的時候，就會想說要怎麼改才會比較舒服，有些是我自己去體會的。大部分都是參考一些我看過的報紙，雜誌也有看（陳煙船，親身訪談，2005 年 1 月 24 日）。

另一種近用學習是如何讓《員》報發的新聞稿、舉辦的社區活動能「搶」上主流媒體版面。部分《員》報成員時常研究報紙的新聞敘事、透過與記者親身接觸瞭解媒體製作及運作規範、公關稿上報後還回頭檢討自己原先發的新聞稿的優劣得失，不但因此瞭解了媒體競合生態、媒體機構的新聞偏好或意識型態，編輯室新聞處理的社會化過程，能分析比較員林等地方新聞報導的好壞，更研究出一套相當適切的與媒體互動的模式（如公關新聞稿要選在假日或記者休假的時段發，如新聞寫作切點要找新鮮、不尋常、媒體沒有報導過等特性，如要提供給記者最方便的服務，所以發新聞稿時，不但有文字，也附上數位照片），果然增加了《員》報新聞的上報率。

一些成員還樂於與社區人分享這些近似反客為主的媒體操作手法。一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在營造他的社區為「雪裡紅酸菜原鄉」的過程中，即向鄉親報成員學習媒體互動之道，從分析媒體新聞呈現中，改進

自己的新聞稿寫作及公關操作，所辦活動也多能贏得主流媒體青睞。這位中小企業老闆投身社區工作多年，如今已是全縣的社區營造模範生。

這些年來，員林各鄰里的社區營造在全彰化縣中表現突出，《員》報成員認為，主流媒體大篇幅、頻繁的報導，在提升社區能見度、喚起社區人參與熱情上的確幫助很大。從這樣的成果看來，員林鎮民可說是與媒體、政府、其他民間社團競爭近用版面的常勝軍，社區報也形塑了一種與主流媒體維持競爭、協商、合作的微妙關係。

（二）媒體察覺與反制

《員》報編採成員平時媒介接觸就相當頻繁，身為一名閱聽人，對商業媒體的現實作為多所認知及批評；在參與社區報工作後，發現社區正面的人事物多到寫不完，不論是身為讀者或作者，都更能切身察覺到大媒體對社區資訊的報導不足、偏頗或誤導。在《員》報寫稿三年有餘的資深國小老師邱美都，進入社區越深，越有這種深刻察覺：

以前想要認識員林，那每次看報紙都沒有，突然有，也只是那一個鎮長涉案，或誰被搶，每次都報這個。我是老師，很受不了每次都報這些，夠爛了還報，為什麼好人都沒有聲音？……

我們要的是一塊純淨的土地，那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我們輕描淡寫過去就算了。我們需要挖掘更多新的人地事物，這才是我們需要的（邱美都，親身訪談，2007年8月26日）。

大約出刊將近一年後，編採群即發現，掌握了一個在地出聲的資源，是可以扭轉這種資訊流不對稱、傳播力不對等的現象。經過摸索、隨興式的「開講」⁵、嘗試，還有讀者的正面回應，參與者察覺到，鄉

親讀者可以接受這種用編採志工自己擅長的方式，去報導他喜歡的題材，正面、溫馨的呈現原本似曾相識或所知有限的人事物，讓讀者能清楚認識當下的社區形貌。

更重要的是，讓市井小民也有機會被社區內外的人看到、聽到，這是「讀者兼作者」認知到主流媒體掌控新聞裁奪權力後，所採行的一種溫和的反制。《員》報議題相當貼近常民生活，把一般媒體眼中的小事當成大事來報導，該報很重視尋常百姓的公共參與，該刊第 15 期正逢母親節過後出刊，那一期刊出了每天照顧學童交通安全的「導護媽媽」報導，不但有照片、有文字，還邀請當地傳承有百年之久的興賢詩社的一位詩人創作傳統詩來讚頌及感謝愛心媽媽。

在編輯團隊的編輯理念裡，讓小人物得到讚美、讓會作古詩的詩人才華在現代生活中也有所發揮，這就是貼近地方脈搏、就是社區媒體擴展社區人際網絡、串起社團連結（connections）的一種方式。

盡量要講社區大家關心的事，我們去注意（報導）它，才會引起共鳴。比方在母親節的時候講出來，把它扣起來，就會引起大家注意。我先觀察志工媽媽，再跟詩人溝通。……

大報範圍那麼大，根本不會注意到這些小事，大報的小事對社區來講是小事，反而是台北的大事對我們來講是小事。……社區媽媽很重要，她們保護我們的孩子上下學，我平常就有注意到，我是員林人，會注意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們都學很遠的東西，很近的東西反而忽略了，本土化就是要從身邊開始啊！員林的事情都不認識，你去台北看櫻花？你也應該撥空看看身邊的東西。……林懷民很辛苦你知道，但在彰化有人跟林懷民一樣辛苦你知不知道？他更需要你的掌聲……你給他掌聲，說不定就可以把他的事情發揚光大，傳給

他的子孫、傳給他的鄰居、傳給社區，我們馬上受惠（黃明權，親身訪談，2005年4月9日）。

《員》報從單一新聞事件到系列報導都在自行設定議題、自己定義新聞，以草根、良善、正面的報導取代商業媒體的疏離、衝突、黃色、黑色的新聞。這些順勢成形的作為，正是其行動力的展現，也可說是一個政治性轉換。

（三）報導與行動相互作用

《員》報成員不只是由在地人建構內容來反制傳統媒體的獨霸作為，他們同時還以公民、文史工作者等多重身份參與更多樣的社區行動，充分展現了這群人的行動力，這是台灣特有的社區情境下的媒介素養學習。長期觀察《員》報運作及細閱其內容，本研究發現，《員》報不只是建構在地資訊，它其實是報導與社區參與相互作用的產物。例如在重建初期，該報志工群除了參與社區報製作，也透過該報發起許多心靈重建、支援災民需求的活動，到了重建中、後期，以及隨後彰化縣政府在社區大力推展社區營造運動時，鄉親報成員尤其活躍，這邊編輯核心以「地方媒體」力量向縣政府催生建構八卦山自然生態園區、主辦縣級的藝術節、大型展覽會，那邊一群供稿者則積極投入地方文史發掘及搶救、社區自然生態調查及推廣、村史書寫等長期社區運動，充分展現出台灣草根社區的另一種軟實力。

在編採群認知中，一份社區報不是只有空談社區意識，更要有行動交相作用以促進改變。《員》報常與彰化教師分會相搭配來舉辦社區活動，形成一個「報導、行動、追蹤報導、持續行動」的循環模式，這套作法似乎是這群「素人記者」向他們原本一直模仿學習的主流媒體的專業提出挑戰。

例如爲了促銷在地休閒及農產，也讓社區人能更深入認識員林，《員》報在 2002 年秋季起，連續五期刊出社區休閒導覽（包括自行車道、八卦山大樹、廟宇、傳統美食、市區公園植物等）的跨版報導。這是編採志工分成好幾隊人馬、各花了一到兩個月時間，地毯式的踏遍員林及鄰近山林所採擷的資料；美術編輯創新設計，以鮮明的水彩地圖爲主、彩色照片爲輔，配上文字簡述，成了一份值得保存的導覽圖。如此有規模、有系統的社區基礎調查，恐怕是員林有始以來的第一次，連主流媒體、地方有線電視台也沒有這樣的創新企圖及大膽嘗試。

這幾期一出刊，果然洛陽紙貴，索閱者眾，由於問路的電話實在太多了，彰化教師分會及《員》報乾脆合辦導覽解說活動。人潮帶動了山上水果銷路，果農地主更進而接受編採成員的建議，學著自己寫企畫書、向政府申請補助，整修、擴大開放休憩環境。往後再經過社區報及主流媒體報導、引起鎮公所注意，再挹注公部門資源，如今有好幾處已是員林著名的休憩景點。

社區報參與者這樣多元、持續、彼此支援、相互學習的社區參與及行動，儼然是一場以實踐力取代抽象理念的社區運動，如此結果已遠遠超越辦報初期的想像，更超越 1970 年代中台灣第一波社區報只做報導、紀錄，刻意「不介入」社區的作爲，甚至比美國 1990 年代前後興起的公共新聞（public journalism），乃至後經「基因突變」而風行的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 Witt, 2004）的社會行動都來得更主動、多樣、廣泛、深耕。

這群媒體近用者甚至也不理會媒體要客觀、中立的傳統規範，把《員》報運作成一份充滿了參與、操作、紀錄、促進、示範等有社區營造特色的社區報，他們透過參與辦報、參與社區等行動，把公共領域從傳統媒體延伸到社區行動上。「有在地報導、也有社區行動」是台灣推

動草根參與社區決策的脈絡下的一種賦權過程，也是西方媒介素養教育所沒有涵蓋的。

綜合上述，通過做中學，幾乎所有《員》報編採志工都習得了社區報近用及製作能力，核心編輯及長期供稿者且能認知、察覺、反思一般媒體產製規範及獨霸作為，逐漸辨識出公共近用與主流媒體的差異，更難得的是，他們還善用這些差異，自發性的採取各式反制行動，逐漸建立起社區媒體的主體性。但是，這種自學式的媒體素養學習，似乎只能到此為止，近用者只能評析社區層級的媒體運作、權力及表現，政治、經濟等更大架構下的權力關係或調度，似乎力有未逮，這在最後章節要討論的。

四、參與、賦權

一場天災、一份社區報，集結了一群有意願參與、卻從未行動過的隱性市民，從校園、自家客廳走進社區，因為參與編採、派送、捐款、甚至一連串社區營造活動，使他們從隱性居民現身成為社區事務的行動者、領導者，改變自己、也改變了社區，此一賦權過程會因不同社區脈絡和情境而有不同的實踐。整體言之，參與式社區媒介本身即是個促進賦權過程的中介物，亦即參與帶來賦權，因為賦權而有更積極的參與及行動，兩者形成一個動態的交互作用。

（一）個人賦權

《員》報的實踐過程讓我們看到，近用社區媒介提供了一個自我發現、突破、反思、成長的機會，使個人得以從想自主、又害怕自主中解放出來。

《員》報開啓了許多撰稿者的第一次經驗。如兼職任教國小鄉土語言課程才幾年的黃月春，個性文靜、內向。透過《員》報的採寫磨練，才知道自己也可以向陌生人做訪問、也可以寫稿、改稿而後刊登出來，透過採訪瞭解了更多人的生活經驗或想法，有助教學，最重要的是因為自我效能提升、產生自我意識而建立起她的自信。

我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寫文章，一開始我有點擔心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那個能力，寫了之後，我自己上課有發現對自己還算滿意，我會發現那些課程內容難不倒我，或是當其他老師有不會的也會來問我，我也可以幫助他們，有很多信心是從這邊建立出來的（黃月春，親身訪談，2006年1月18日）。

《員》報也是員林當下一些文史作家的啓蒙師，「走進社區」激發他們對古早家鄉的再認識、產生對自己生長社區的認同和珍惜，經過反思、進而領先官方或學術工作者取得在地文化的詮釋權，也為自己及社區未來重新定位。

如對文史工作者曹武賀而言，《員》報就是開啓他生命轉折的一把鑰匙。他原是做淨水器販賣工作，地震當天還在家裡打電動玩具；因為參與《員》報而開始學電腦打字及影像處理，快速累積了為當代做紀錄的能力和權力，進而意識到自己對員林有責任、對《員》報有義務，就是這份認同和使命感驅使他不停的寫作、拍照，後來他乾脆棄商從文，專事文史工作。

我的寫作也是「九二一」（地震）之後才開始的，之前只是閱讀。看到發生那麼大的災難之後，會讓人擺脫傳統束縛，我以前覺得寫都寫不好，要怎麼留傳到以後？後來越寫越順，意識到我們如果不寫，可以留下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少。……

當我認識鄉土越多、（就）越想認識它，外面新資訊不斷進來，從事田野調查的過程中，認識很多人，提供我新聞，就慢慢地寫，就出書。……

《鄉親報》是寫作者和這報直接連結，是唇齒相依的。……寫這東西雖然不是什麼高深學問，但真的可以為後代留下許多東西。好的文學作品可以流傳千百年，我希望一百年、兩百年之後，當有人來研究員林歷史時，會看到《鄉親報》、看到裡面的作者如何用心耕作員林這塊地方（曹武賀，親身訪談，2005年4月8日）。……

已出版四本村史的張碧霞，原擅寫散文、新詩，從未寫過長篇報導或出書，也沒參與過社區活動。二〇〇四年她剛從國中教職退休就投入社區，一邊書寫村史、學拍紀錄片，一邊推動自家社區營造。張碧霞從著手第一本村史開始，就因為採訪許多耆老，常有人受訪後不久就過世了，惋惜之餘，也讓她重新思索生命的價值，更堅定自己對社區的投入。

你出去採訪就會發現生命真的很短暫，人在這麼短暫的生命裡要盡快想辦法留下一點什麼，至少我寫村史，如果真的完成，這份村史便會像歷史一樣留下來，我至少會有這個使命感，（想）為這個地方留下一些東西，就像發現這個斗笠，⁶已經多少年沒有人去提到這東西了，我就把它重新挖（掘）出來，去喚醒這個村子過去共同的記憶（張碧霞，親身訪談，2005年4月8日）。

（二）從個人到社區賦權

這種草根式的文化詮釋或公民文化權的覺醒與爭取，並不只限於供

稿者本人，《員》報其實是透過其大家族成員展現其更普及的賦權過程。像國小老師黃文堯是無意間看到了《員》報刊出的一張客家古厝照片，才驚訝發現自己的身世，「之前活了四十幾年，竟然不知道自己是福佬客（註：即客家後裔）！」從此展開了他的客家尋根之旅，投身研究那棟他剛出生就離開了的百年家族古厝，後來他把辛苦拍攝的古厝照片編成教案，不但得到教材比賽特獎，還由縣政府編入鄉土教材裡。這位攝影賽上的常勝客，從此把他的相機鏡頭從外縣市景點轉向了員林鎮社區，立志要為社區作影像紀錄。鄉親報的一張照片激起了一個人或一群人的族群意識覺醒，進一步為其族群文化貢獻心力，甚至為社區動念、採取行動。這樣的改變、賦權，在一些與社區報認同度高的讀者身上不時發現。

當然相較之下，社區報積極參與者熟悉傳播技能、媒體公關，社區連結既深又廣，在產製、行動過程中，賦權、改進集體生活、改變社區權力關係的情況就更加明顯。

靜修國小鄉土教學老師邱美都，即是個充分賦權的《員》報寫手。她在《員》報寫了一年多文史報導後，覺得自己應該還有潛力寫長篇創作，於是前往社區大學進修，精進寫作功力。她從 2004 年起開始著手村史書寫，至 2011 年中為止，七年期間她總共出版了八本圖文並茂的村史著作，是全彰化縣最多產的村史作家，其中三本分年獲得「彰化漢溪文學獎」中的報導文學獎。此外，她還參與了許多員林文化古蹟的搶救運動，2010 年一月底，她與族人合力動員社區文史界，成功搶救了一座有 250 年歷史的自家邱氏老宅第，歷時半年，終於由縣政府列為地方三級古蹟，改變了險遭商業開發的命運。

邱美都的社區熱誠和實踐力應該說是源自《員》報的參與經歷。二〇〇五年她在談及她的第二本村史寫作計畫時，不時提到這份社區報給

她思維及行動的改造：

我很有信心和把握，因為過去跟《鄉親報》在一起，從《員林鄉親報》的夥伴身上，學會怎樣自己去做公關，怎樣自己寫稿子發新聞稿，怎樣去告訴別人理念，我要寫村史，也都是我自己去找社區人士來配合和受訪。……

今年的想法是，光寫村史不夠，我想一邊作鄉土教學，一邊提供社區營造，一邊紀錄社區文化歷史，還想參加文學競賽，透過多元角度，為社區直接做一點有影響力的文史工作。我主動找里長、發展協會理事長、社區讀書會會長等等，提供他們更具體的鄉土故事，甚至，我服務的學校，我已訓練 25 位校園說故事服務隊，提供社區故事給義工到班級向小朋友講故事。你看我這樣做的，其實跟《鄉親報》對社區土地的愛是相同的。我的感覺是，之前我必須要透過《員林鄉親報》才能走入社區，現在感覺可以一個人去影響社區，那種感覺好棒喔，就是很有尊榮，呵呵（邱美都，親身訪談，2005 年 1 月 25 日）。

編採群因為參與社區，每個人又自我賦權發展出新興趣、新潛能，深耕一塊社區公共領域，先是文化權的爭取，繼之逐漸在地方政治上產生了一定作用。二〇〇五年底地方選舉時，員林鎮長候選人吳宗憲邀請江錦田、邱美都來執筆寫他的文化政策白皮書，兩人趁勢把大家平時所談論、所想像的文化願景「把它綁在裡面，不管怎樣（如果）他當選的話，也許某個機會我們可以督促他往這方面思考」（江錦田，親身訪談，2006 年 1 月 19 日）。

吳宗憲當選鎮長後，果然一上任立即著手編寫自 1990 年後即不曾更新的員林鎮誌，其次更積極推動村史書寫，希望每個村莊都有一本村

史；員林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幾乎都受邀參與，另外他還新成立文化觀光部門，企畫以社區文史來推展地方產業，結果向中央爭取到連續多年的高額地方建設補助。「一個地方要有文化、歷史，這個地方才有發展，當然住在這裡的人對這塊土地有感情，就會想要付出」（吳宗憲，親身訪談，2006 年 6 月 29 日）。⁷

從個人賦權到社區賦權，從個人、小組、一群人到網絡式的連結及參與，乃至與地方決策者形成垂直式的連結，《員》報展現了旺盛的行動力和深縱的影響力；這些成員參與社區，每個階段各有不同的能力及要求，他們樂於挑戰自我，也挑戰社區既有機制，有一天終於有機會取得了在地文化發展的主導權，也毫不猶豫的推出彼等對社區的想像，了卻了這群人「文化造鎮」的心願。

伍、結論與討論

二〇〇五年底，江錦田趁著地方選舉之便，將第 50 期《員》報以選舉文宣方式印製了 36,000 份，送到員林鎮每一戶人家，算是圓了他「家家都有一份鄉親報」的夢想。如今《員》報雖已停刊，但它的團隊成員都已茁壯、獨當一面，繼續參與、甚至領導社區公共事務，該報的精神繼續在傳承著。

這樣一分由社區基層主動參與製作、獨立經營、非營利的媒介運作經驗，這對台灣媒介環境、社區傳播、社區發展、台灣社會發展都算是一個創新嘗試，這項創舉顯示：台灣的另類媒介可以有行動、有抗爭，但也可以是溫和、積極、持續、有具體成效的，而且，這種小型公共傳播亦擴大了公共領域範疇，從傳統媒介延伸到多樣多元的社區行動上。

這種參與式社區傳播實踐也意味著，以社區為實驗場域，讓市民參

與媒介製作及經營，可能是台灣目前一般大眾媒介素養養成的一個相當好的學習之道。我們看到一群市民從將其構想、意識型態、社區關懷轉換為內容、社區行動時，本身就是一個反思、質疑的過程，雖然這些公教人員可能原本有意避開地方政治糾葛，或是也沒什麼政治動機，但近用、參與過程中自然就形成了一個政治性轉換（King & Mele, 1999），先是對公共領域中的文化面、社會面產生質疑，進而設法集結同好去討論、面對、行動，縱有許多失敗經驗，卻也總是逐次累積為下次行動的能量，並從這樣的賦權過程中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社區。

從「做中學」培養出的媒介素養，對社區報的參與者而言，這也可能意謂著他們將更有可能理解目前的主流媒體資訊處理的過程，這樣的訓練對於培養媒體監督的能力，以長遠來看，是不可小覷的力量。何況，他們還具有抵制、超越主流媒體的意願及行動力，像貼近社區脈膊，讓鄉親彼此看見、重新定義社區新聞等「心存社區」之舉，商業媒體早已遺忘，卻可能就是未來社區媒介逐漸威脅商業媒體的利器。

參與社區傳播甚至也讓市民有了產製社區資訊、地方知識的正當性及主體性。或許是一開始就自認為不是報紙、報人，沒有要謹守客觀中立的包袱，《員》報參與者可以想登什麼就去採什麼，他們謹慎拿捏地方政治運作與編採群的意識型態，進而取得發聲權、文化詮釋權，無形中累積了豐厚的政治資本、社會資本及文化資本，《員》報這群人漸漸都成了左右地方事務的要角。如今雖然報紙已停刊，以員報大家族為主的市民的社區行動力卻越來越強，行動所及的公共領域也越來越廣。從救災、重建過渡到承平時代之，參與式社區報為台灣新形社區傳播立下一個正面示範，也足堪為現今八八水災社區重建的社區傳播做一參考。

不過，鄉親報「做中學」的實踐也帶出了若干新聞學上的疑慮。一是政商力量與媒體自主性的思考，一是對社區報公共性的認知及實踐。

前文述及小眾媒介的「另類貧民窟」宿命，《員林鄉親報》發行兩年多後便擺脫不了此一無解命題，尤其在後期必須自籌財源時，逢到選舉便會出現政治廣告「置入性行銷」現象。曾有一位立法委員候選人連續購買多期廣告，第一期（第 37 期）該報以專訪、特稿形式刊出，佔頭版三分之二版面，之後候選人政見以「系列報導」形式相繼出現在四版頭條（第 40、41、42、43 期）及四版下半版（第 38、39 期）；2005 年鎮長選舉時，該報第 50 期則以頭版整版刊登當時一位鎮長候選人的專訪，全版內容由《員》報一手主導企畫、訪問到版面呈現。編輯的解釋是「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樣的廣告。」

除了政商力的取捨外，社區報及其主要參與者的社會位置也一直是個爭論議題。《員》報從核心編輯到撰稿群一直都是以多重身份熱心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於是就出現了一邊以「文史工作者」身份參與辦報，一邊以「老員林人」身份成爲縣長、鎮長等候選人競選團隊中的要角，或是如前所述，還是文化政策幕後設計者及執筆人，這些人不只是站在一旁看遊行、也去參與遊行了，新聞學理上，這是有違倫理、要接受指摘的。但在台灣連主流媒體地方記者和地方政商權力關係也是牽連不清的現況下，我們如何以教科書上的標準來要求、批判這些世居於此的社區人要劃清媒體人、社區人的界限？這是理想與現實間的弔詭。

也因爲不認爲社區報是媒體，實踐面上出現了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社區媒體的公共性。歐美自由民主派學者早就認爲，近用資訊、多元辯論、多元呈現是民主的基本前提，Carey（1989）因此提出，不論公、私傳播機構均是基本公共財，本就應有責任提供人民行使公民權時所需的必要資源。Hamelink（1995）也主張，傳播是促進賦權、改造社會的重要工具，「人們需要做決策的知識及資訊，也需要表達意見、對話、分享經驗」（p. 132）。

當市民在近用社區媒介時理應認識到，地方性媒體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在提供社區居民足夠與公共生活有關的資訊，以助民眾做決策，而且社區媒體就是社區公共領域，任何人都可在此自由表達意見、參與辯論，但是這樣的論述在台灣地方媒介實踐上卻有障礙。

《員》報在公共事務上報導有限，促進公共議題的討論更少，遑論多元辯論、多元呈現的公共性展現。《員》報也偶有公共議題的討論，如刊登員林鎮社會大學校長對員林文化願景的想像、資深高中校長呼籲家長讓子弟就近就學、不要迷信外縣市的明星高中，或是一介普通市民在選舉過後，提醒立委當選人要面對員林鎮陳年的建設懸案，寄望他們向中央爭取支援等文章，但是和密集、大篇幅的文史及生態報導相比，落差極大，而且並未延續話題、引起討論或對話，進而成為社區共同關注議題、甚或有所行動協力去解決，至於對掌握資源者的監督更是闕如。政治性功能不足多少可以解釋，何以員林鄉親可以坐視《原》報熄燈、而沒有積極挽救的行動。

公共事務議題報導及探討不足，可能是當下台灣大部分社區媒體共有的難題。可能原因，一是可能與台灣特有的地方文化有關，再者，公共事務本身的專業性較高，不易入門。

前文述及，台灣大都會以外的縣市鄉鎮或鄉村，民風保守，家族世居於此，人際關係綿密而複雜，處事以和為貴，或恐遭到有形無形的壓力或抵制，民眾遇有不公不義之事，只會私下談論，即街談巷議的不少，但有意願公開或具名論事者則缺。換言之，民主討論之風還未普及。

再者，台灣地方政治派系複雜，選舉頻繁，政黨對立嚴重，一般民眾多不願意招惹政治是非。《員》報志工以學校教師居多，他們均保持形式上的中立，即使為社區報撰稿，多半都避談政治，或表明對政治議

題沒興趣，只有一、兩人可以掌握公共性議題的處理。社區報工作者也不具「記者」的正當性，到公家機關索取資料，不少基層公務員不論資料是否具公開性，一律拒絕民眾索取、查閱，有些《員》報撰稿人向鎮公所要資料碰了幾次壁後，也就意興闌珊了。

社區報如何拿捏處理政商勢力的介入？地方媒體應是社會的公共財，抑或只是一些利益團體或同好者發行的社團機關刊物？社區媒體是否也有「監督」社區機制之權？社區報撰稿者是否也可以是新聞記者？是否有採訪公共機構的正當性？民眾的知情權、對政府資訊公開法規的認知如何？等的認知及討論，似乎都應該是媒介素養教育及研究者該更務實、深入探索的面向。

《員林鄉親報》是重大災難發生後，為加強有權者與重建區民眾溝通、由政府全力輔導而生的一個小範圍傳播的媒體，歷時四年半，重建任務結束、《員》報也已停刊，但這家小媒體對近用者、社區民眾所激發出的「認識自己、愛自己」的社區意識、「使社區更美好」的行動力卻還在不斷發酵、累積能量，這種促進「改變」的熱誠及持續參與的精神，可說是台灣社區傳播發展的奇蹟。這份社區報在員林鎮特定的社會脈絡下，以近用、參與、報導、媒介素養、行動等要素交相運作，形塑了一個非線性的、動態的社區傳播新貌，不但擴大了社區公共領域的範疇，從主流媒體延伸到社區行動，它也顯示，主動參與媒介產製及運作是一般社會人士習得媒介素養的最佳途徑，這些能力不但讓他們能與主流媒體協商、競爭、抗衡，甚至還有權力通過賦權、行動過程促進個人及社區改變，讓社區民眾不再只是資訊的消費者，更是有行動力的公民。不過，社區報參與者「作中學」所學仍有所不足，對於洞悉政治、經濟、社會大架構下的媒體與外界的關係、權力、協商等思辯能力有待加強。

就在 2009 年 8 月，亦即九二一地震後整十年，台灣再度遭到空前嚴重的天災侵襲，莫拉克颱風帶來了台灣 50 年來空前豪雨橫掃全台，以原住民為主的東部、中南部山區都成了重災區。在漫漫的重建路上，員林鎮「報導加行動」的社區傳播賦權經驗也許無法複製，但仍有相當借鏡價值，傳播研究者應站在這樣的巨人肩膀上，加上十年來新科技快速演變的加持，繼續關注台灣小眾、社區傳播及社區公共領域的實踐及深化理論論述，這也應該是今天台灣媒介素養社會養成教育的一大重要面向。

註釋

- 1 新聞局前地方新聞處處長盧榮生指出（盧榮生，電話訪談，2005 年 4 月 16 日），地新處輔導 20 家社區報，平均每家每年獲得補助約 100 萬元，包括印刷、人事、行政管銷等費。但來自社區報資料顯示，這應是新聞局補助最高峰之統計，各報出刊第一年地新處其實只有補助印刷費。
- 2 《土地之夢》於 2000 年初出刊，是「彰化故鄉重建隊」針對員林災民不定期發行的一份新聞信，主要在報告該隊之救災業務，共發行六期、於 2001 年初停刊。不久，即被新聞局看中予以輔導復刊，逐漸轉型為社區報。
- 3 在《員》報發行將屆三週年時，江錦田為文指出（2003 年 12 月 15 日），該報發行 33 期，靠的全是鄉親數百人次之義務投入，及數千個工作天的免費付出。
- 4 有些供稿者因其文稿在《員》報上刊登而受邀到員林社區大學開課，《員》報也主動在社大開設地方文史、生態課程，免費給社區居民選修，首開社區報與地方終身學習體系合作的先例。
- 5 在編採群士氣正盛時，時常有隨興而起的「論壇」，眾人或在果園的楊桃樹下、路邊攤火鍋店、或侷促的編輯室裡，在小茶、小酒助興下，「閒聊或講一講」到半夜，《員》報許多田野調查、專題構想就是這麼醞釀出來的。這似乎就是哈伯瑪斯所說的、十九世紀歐洲的「咖啡館式」的公共論壇。
- 6 張碧霞在蒐集村史資料途中，無意間發掘到已經失傳的斗笠編作技術，馬上圖文報導刊登在《鄉親報》上，主流媒體隨即跟進，她的村莊立即被彰化縣政府、全員林人都看到了，村人才因此有了社造概念，繼而參與她所發動的系列社造活動。

- 7 吳宗憲於 2009 年 12 月，以空前最高得票率、八成二的紀錄獲選連任員林鎮長，獲得高票的政績之一即是他推動了很多藝文、民俗、觀光活動，讓員林動起來了。但是，第二任鎮長上任後不久，吳氏即遭人檢舉索賄千萬元，於 2010 年 7 月遭法院聲押禁見，也創下該鎮一連三任鎮長都涉案被收押的紀錄；今（2011）年 2 月吳氏交保復職，4 月再遭監察院彈劾。員林部分藝文人士對此相當包容，認為索賄文化積習良久，再者，他都照著選舉承諾兌現文化建設，讓員林被外界看到，比起以往首長幾無文化建樹要強的多。

參考書目

- 王麗雲、潘慧玲（2000）。〈教師張權益能的概念與實施策略〉，《教育研究集刊》，44: 173-199。
- 江錦田（2005 年 4 月 25 日）。〈《員林鄉親報》與 921 地震之社區重建〉，「社區媒介與社區傳播的再起」校園講座，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系。
- 江錦田（2003 年 12 月 15 日）。〈賀彰化教師會成立 給鄉親的一封信〉，《員林鄉親報》，第 1 版。
- 林福岳（2002）。《族群認同下的社區傳播：以美濃反水庫運動論述為研究脈絡》。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論文。
- 吳翠珍（2004）。〈媒體素養與媒體素養教育的流變與思辯〉，翁秀琪（編），《臺灣傳播學的想像》（下），頁 811-841。台北：巨流。
- 孫曼蘋（2001 年 1 月）。〈參與者？中立者？社區媒介與社區關係之探討——以南投縣埔里鎮社區報《希望·埔里》為例〉，「傳播社群與社會整合」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 孫曼蘋（2002 年 5 月）。〈社區媒介與公眾服務之探討——以南投縣埔里鎮《水沙連》雜誌為例〉，「傳播學術新發展：傳承與展望」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系。
- 孫曼蘋（2009）。〈公民新聞 2.0：台灣公民新聞與「新農業文化再造」形塑之初探〉，《傳播與社會學刊》，9: 153-180。
- 翁秀琪（1993）。〈台灣的地下媒體〉，鄭瑞城、王振寰、林子儀、劉靜怡、蘇蘅、瞿海源…李金銓（合著），《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頁 441-517。台北：澄社。
- 張麗春、顏婉娟、呂素英（2006）。〈員工充能模式於公共衛生護理之應用與省思〉，《護理雜誌》，53(2): 11-17。
- 陳世敏（1992）。〈新聞自由與接近使用媒介權〉。翁秀琪、蔡明誠（編），《大

- 眾傳播法手冊》，頁 219-247。台北：政大新聞研究所。
- 陳世敏（2005）。〈媒介素養的基本概念〉，周典芳、陳國明（編），《媒介素養概論》，頁 3-22。台北：五南。
- 粘容慈（2004）。《重新發現力量：高齡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賦權經驗》。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馮建三（1995）。〈異議媒體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 177-234。
- 管中祥（2009）。〈光影游擊最前線：台灣另類媒體 2007-2008〉，《新聞學研究》，99: 201-220。
- 蔡鶯鶯、徐永年、林永隆（2003）。〈參與行動研究：921 地震後中崙社區健康營造研究案例〉，《新聞學研究》，77: 23-65。
- 薛曼娜、葉明理（2006）。〈社區老人權能激發過程之概念分析〉，《護理雜誌》，53(2): 5-10。
- 謝國興（編）（2001）。《協力與培力：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兩年工作紀要》，台北：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
- Anderson, J. A., & Ploghoft, M. E. (1993). Children and media in media education. In G. L. Berry & J. K. Asamen (Eds.), *Children and television: Images in a changing socio-cultural world* (pp. 89-102). Newbury Park, CA: Sage.
- Atton, C. (2002). *Alternative media*. London, UK: Sage.
- Aufderheide, P. (Ed.). (1993). *Media literacy: 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 Aspen, CO: Aspen Institute.
- Barlow, D. (2002). Conceptions of 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in Australian community radio stations. In N. Jankowski & O. Prehn (Eds.), *Community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pp. 141-161).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Boehm, A., & Boehm, E. (2003). Community theaters as a means of empowerment in social work.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3), 283-300.
- Boyle, D. (1997). *Subject to change: Guerrilla television revis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ey, J. (1989). Reconceiving “mass” and “media”. In J.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UK: Unwin Hyman.
- Chattopadhyaya, K. (1983). *India women battle for freedom*. Delhi, India: Abhinav.
- Christ, W. G., & Potter, W. J. (1998). Media literacy, media education, and the academ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 5-15.
- Devine, R. (1992). From the mind’s eye of the user: The sense-making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In J. D. Glazier & R. R. Powell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p. 61-84). Englewood, CO: Libraries Unlimited.
- Forde, S. (1997). A descriptive look at the public role of Australian independent

- alternative press.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3, 118-30.
- Forde, S., Foxwell, K., & Meadows, M. (2003).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local: Public arena journalism in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broadcasting sector. *Journalism*, 4(3), 314-335.
- Forde, S., Meadows, M., & Foxwell, K. (2003). Community radio and local culture: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 *Communication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3), 231-253.
- Freire, P. (1972).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NY: Seabury Press.
- Gutierrez, L. (1994). Beyond coping: 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on stressful life events.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21(3), 201-219.
- Hamelink, J. (1995). *World communication: Disempowerment and self-empowerment*. London, UK: Zed Book.
- Hartley, J. (2002). *Communicatio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UK: Routledge.
- Higgins, J. (1999). Community television and the vision of media literacy, social action, and empowerment.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3(4), 624-644.
- Hollander, E. & Stappers, J. (1992). Community media and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n N. Jankowski, O. Prehn. & J. Strappers (Eds.), *The people's voice: Loc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Europe* (pp. 117-127). London, UK: John Libbey.
- Hollander, E., Stappers, J., & Jankowski, N. (2002). Community media and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n N. Jankowski & O. Prehn (Eds.), *Community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pp. 19-30).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Jankowski, N. W. (2002). The conceptual contours of community media. In N. W. Jankowski & O. Prehn (Eds.), *Community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pp. 3-16).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Jayawardana, K. (1988).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UK: Zed Books.
- Johnson, F. (1994). The real work is media education. *Community Media Review*, 17(1), 4-5
- King, D., & Mele, C. (1999). Making public access televis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dia lite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3(4), 603-623.
- Lewis, P. (2002). Radio theory and community radio. In N. W. Jankowski & O. Prehn (Eds.), *Community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pp. 47-61).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Liddle, J., & Joshi, R. (1986). *Daughters of independence: Class, caste, gender in India*. London, UK: Zed Books.
- Livingstone, S. (2004). Media liter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ommunication Review*, 7(1), 3-14.

- Masterman, L. (1985). *Teaching the media*. London, UK: Comedia Publishing Group.
- Masterman, L. (1992). A distinctive mode of enquiry: Towards critical autonomy. In M. Alvarado & O. Boyd-Barrett (Eds.), *Media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pp. 102-103). London, UK: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McQuail, D. (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 Meadows, M., Forde, S., Ewart, J., & Foxwell, K. (2009). Making good sens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in community journalism. *Journalism*, 10(2), 155-170.
- Murdock, G., & Golding, P. (1989).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political inequality: citizenship in the age of privatize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9(3), 180-195.
- Nigg, H., & Wade, G. (1980). *Community media: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n the UK: Video, local TV, film, and photography*. Zürich, Switzerland: Regenbogen-Verlag.
- Nosseck, H. (2003). Active research as a bridg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 suggested model for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organizing community television as a tool of empowerment in the 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3), 305-322.
- Novak, E. M. (1995). Buried treasure: The community newspaper as an empowerment strategy for African 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 69-88.
- Pinkett, R., & O'Bryant, R. (2003). Build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self-sufficienc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6(2), 187-210.
- Rogers, E., & Singhal, A. (2003).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7, 67-85.
- Schwarz, G. (2005). Overview: What is media literacy, who cares, and why? In G. Schwarz & P. Brown. (Eds.), *Media literacy: Transform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pp. 5-17). Malden, MA: Blackwell.
- Solomon, B. (1976). *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 P. N. (1993).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Media Asia*, 20(2), 63-65.
- Williams, R. (1980).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London, UK: Verso.
- Witt, L. (2004). Is public journalism morphing into the public's journalism?. *National Civic Review*, 93(3), 49-57.
- Zimmerman, M. A. (1995).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ssues and illust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3(5), 581-599.

Local Voices, Media Literacy and Social Actions: A Case Study of *Yuan-lin Folks Press*

Mine-ping Sun*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d the operation of a citizen medium — *Yuan-lin Folks Press* (2000-2005) in a small town in central Taiwan. By viewing the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dia access, media literacy as well as empowerment, the study indicated how local voices and images can be seen and heard by the general public, and how local citizens gained the rights of local culture interpretation for their own community.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via long-term observation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in 1999.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within the contexts of a specific community of Yuan-lin Township, the media had created a new form of bottom-up non-linear, and dynamic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terplaying with participation, producing, and media literacy of “learning by doing” as well as community actions.

This innovative form had not only expanded the public sphere from the traditional media to the community actions, but also showed that the small media might be able to compete, negotiate and cooperate with the mainstream media. Furthermore, it may as well change the nature of community and society through self-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Keywords: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newspaper, empowerment, media access, media literacy,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 Mine-ping Su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